

## “九一三事件”后批林纠左析论

智 杰<sup>1</sup>, 董 佳<sup>2</sup>

(1. 中国石油冀东油田公司 企业文化处, 河北 唐山 063004; 2.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九一三事件”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提供了契机, 毛泽东在批林中开始更正“文革”的一些极左做法。一场由周恩来所领导的纠左工作随之展开, 并在解放老干部、整顿国民经济和推动科教界纠左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但此举很快受到江青等人的反击。此时毛泽东既要纠正文革中的某些极左做法, 又不愿从根本上否定“文革”。这种矛盾心态最终导致“九一三事件”后纠左工作被迫中止。

**关 键 词:** 九一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 批林纠左; 毛泽东; 周恩来

中图分类号: D6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2-0092-05

## “Correcting the left” after the 9.13 Incident

ZHI Jie<sup>1</sup>, DONG Jia<sup>2</sup>

(1. Jidong Oilfield Enterprise Institute of Chinese Oil Company, Tangshan 063004, China;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CCP,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9.13 Incident, Mao Zedong appeared to object the leftist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Zhou Enlai tried to correct their practices. However, this at temptation was soon attacked by Jiang Qing and her colleagues. It was mainly because of Mao Zedong's complex contradictory mentality. On one hand, Mao believed some ultra-leftist practices should be rectified; on the other hand, he did not wish to deny it fundamentally. And this ambivalence led to the correcting work halted eventually.

**Key Words:** 9.13 Incident; Cultural revolution; Correcting the Leftist movement; Mao Zedong; Zhou Enlai

“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sup>[1]</sup>毛泽东由此开始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 并对某些极左做法做出纠正, 这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提供了良好契机。在这一背景下, 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开启了第一次试图纠正文革错误的尝试, 但是在江青集团的围攻和反击下, 纠正工作最终陷入停顿。笔者拟对“九一三”事件后批林纠左工作进行全面梳理, 并深入剖析纠左工作陷于停顿的根源。

### 一、九一三事件后批林纠左的成果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五年前, 林彪还在全

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反革命政变, 口口声声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转眼间, 这个在世人眼中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党的第二号人物竟要谋害党的最高领导人, 另立中央。多年来, 毛泽东一直提醒人们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类的人物, 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复辟。但没想到, 这颗他一直警醒别人要注意的“炸弹”竟在自己身边爆炸, 而谋害他的竟是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这件事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

不过, 从另一方面而言, 毛泽东对林彪实际上也并非没有警惕。特别是对他文革以来一再违背自己意愿, 全力推动个人崇拜的做法, 毛泽东颇有微词。还在 1967 年南巡和 1968 年的“斗、批、改”阶段, 毛泽东就结合当时形势提出要实现大联合、落实政策的方针, 要求改变“造反夺权”、“天下大

收稿日期: 2011-09-22

作者简介: 智 杰(1981—), 男, 山西定襄人, 政工师,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乱”的做法，纠正在对内对外宣传中个人崇拜过于突出的错误倾向。为此，他专门做出批示，禁止各地建造“劳民伤财”的毛主席塑像，反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禁止给领导人祝寿。1969年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也提出要制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提法。

故而“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及时吸取教训，一方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残余进行彻底清查，另一方面也开始重点对“文革”中存在的极左思潮进行纠正。1972年6月28日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谈及当时正热忱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造反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这里，毛泽东一反“文化大革命”初期“支持左派”的立场，而称呼造反派为“左派”，并把“左派”定性为“反革命”，将林彪视为“左派”的“总后台”。这是毛泽东自1967年下半年后对极左日渐积累的不满和对林彪集团严重危害性认识的明确表现。因此，也可视为是毛泽东本人对文革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为了进一步处理“九一三”事件的遗留问题，毛泽东感到相对稳定的国内政局是必要的。为此他主动接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更正了“文革”初期的许多错误做法，平反了领导干部中的大量冤假错案，重新落实了党的政策。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座谈会的同志时，对叶剑英和其他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6日陈毅弥留之际，毛泽东亦特别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说：“现在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陈毅逝世后，毛泽东冒着严寒极为罕见地亲自参加了其追悼会。在与张茜的言谈中，毛泽东对陈毅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强调：如果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此后，毛泽东也在各种场合不断重申自己对“二

月逆流”的正面评价，反复提及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驰骋疆场及建国后为建设呕心沥血的赫赫功劳，并把自己同受到林彪打击迫害的老同志视为一体。此外，从1972年1月到1973年底，毛泽东还先后指示，陆续纠正了对苏振华、杨成武、贺诚、廖汉生、林枫、叶飞、郭化若、罗瑞卿等人的错误处理和冤假错案，使一大批老干部得以重新复出。1972年底，毛泽东在看到铁道部负责人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所写的反映被押老干部在监狱中忍受非人待遇的来信后，极为震怒，当即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更明白无误地坦言，要对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承认自己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要做自我批评。<sup>[2]</sup>

当然，在对众多冤假错案的平反中，最重要的是结束对邓小平隔离审查并恢复其工作。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对林彪进行了严厉批判。不久，经毛泽东批准，1973年2月邓小平终于登上了回京的火车，离开了劳动3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终于得以恢复工作。邓小平的复出是整个老干部“解放”中一个令人鼓舞的重大成果，极有利于其他老干部的“解放”。因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复出”了，其他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也就自然不是问题了。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开始明确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面对一浪高过一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为了扭转文革中各项工作的困局，周恩来亦不惜冒险亲自对纠左工作进行部署，力图把党的各项工作重新引入正轨。从1971年底开始，一场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纠左运动开始在全国展开。

(1) 解放老干部。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了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后经他亲自审阅后发表。社论针对

“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遭受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文中特别指出: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篇社论在当时对于重新使用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政治思想障碍的作用,集中体现了周恩来要求落实老干部政策的强烈愿望。后来,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老干部获得自由,有的复出后还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不言而喻,这种解救“被打倒”老干部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对文革中某些极左做法的纠正,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否定。

(2) 整顿国民经济。1971年1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的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作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这三个通知对从全局上稳定国民经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12月,周恩来提出了整顿企业,加强企业管理,恢复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意见。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要求各级企业逐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经济核算等管理制度。由此,全国各企业开始不同程度地恢复生产、健全制度。在农业方面,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化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此外,周恩来还积极说服毛泽东打开国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1972年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一同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进口8套化肥、化纤生产成套设备。<sup>[3]</sup>通过整顿,国民经济有了较大改观,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较1971年有了大幅增长。

(3) 推动科教界纠左。为了推动各系统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周恩来从1972年开始逐渐把纠左的重点放在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希望尽快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使他们更好地投入工作。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对其有关大力倡导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意见深表赞同,还连连夸奖其说话实在:就连“毛主席看了他的讲

话后,都赞扬他”。周恩来还当场指示周培源(著名物理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9月11日,周恩来在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又说:“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与科学试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sup>[4]</sup>

## 二、“纠左”与“反纠左”的较量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张,江青等自然表示反对。对他们而言,阶级斗争就是生命,绝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因此,他们对批极左运动极为仇视,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人民日报》和另外几个单位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他尖锐地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姚文元在周恩来8月1日讲话后,分别找人民日报社几个负责人谈话,针锋相对地提出: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不仅如此,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还先后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sup>[5]</sup>对此,《人民日报》理论部极为反感,坚持在10月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辽宁发电厂坚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一文,报道中也再次出现坚决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字样。这立即引来江青等人的暴怒,追问“稿子是怎么来的”,并亲自布置追查。最后此事虽由于周恩来当时代管《人民日报》而不了了之,<sup>[6]</sup>但由此看来,周恩来和江青等人的对立和斗争已十分明显。

随着时局的发展,双方的斗争愈发激烈。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情势报告中指出:此时全国各地仍有一些单位和地方没有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左思潮予以彻底批判和肃清,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一些环节上还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所以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

议，以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和执行中央革命外交路线。对此，周恩来表示同意。但次日，张春桥却在“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表示异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与张春桥略带婉转的反对意见相较，江青的态度十分鲜明，直截了当地表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要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sup>[7]</sup>很明显，张、江二人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反对在批林时夹带批判极左和无政府主义。这是因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正当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的时候，王若水代表人民日报社上书毛泽东，促请他在纠左及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能予以明确表态。王本人曾组织《人民日报》10月14日批判极左思潮文章的活动，他对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极为不满。故而在12月5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八月八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过了头？”作为信中的结论，他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sup>[8]</sup>对于王若水的这封信，毛泽东高度重视。结合最近一段时间他对时局发展形势的判断，他认为这一问题关系重大，牵扯到文革的存续，乃至如何审视和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一关乎全局的战略问题。在这方面，始终坚持文革错误的毛泽东是不可能支持周恩来深入纠左及批判极左思潮意见的。于是，12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召开了中央内部会议。在会上，他表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sup>[9]</sup>就这样，毛泽东的立场使党内高层围绕是不是继续纠左、批判极左思潮的分歧最终告一段落，周恩来的纠左计划就此搁浅。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元旦刊出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中共中央各主流报刊受江青等极左激进派指挥，都调转方向重点批判林彪“颠覆无产阶级

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而对如何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则不约而同保持了沉默。受此影响，全国各地报刊亦纷纷调整方向，大张旗鼓集中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这种情况导致本已蓬勃兴起的纠左势头受到抑制，整个社会环境又重新笼罩在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重重霾雾中了。

### 三、“纠左”工作陷于停顿的根源

很显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暂时取胜而告终，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由此一蹶不振而陷入停滞。事实说明，决定这场斗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毛泽东的态度。正是有了毛泽东对激进左倾的明确表态，才使得本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处境尴尬的江青等人重新活跃起来，进而敢于向周恩来公开发难。而周的处境则恰恰与之相反，随着形势的急转，只能采取含蓄、婉转的方式迂回进行斗争。那么，这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作为发动和操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为何一开始对纠左表示支持，最后却又明确表示反对了呢？事实上，毛泽东确实对极左存有不满，但这个不满亦有限度。他对纠正文革中某些具体的问题虽不持有异议，但却不能容忍任何人有敢于否定文革的意思，哪怕对这个问题只是试探性的触碰都是不可饶恕的。这一点从毛泽东一开始把“左派”定性为“反革命”，林彪为“左派总后台”，后来又突然把林彪路线称之为“极右”的转变上看就非常清楚了。很明显，毛泽东拒绝旨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尝试。而毛泽东之所以会在“九一三事件”后持有上述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了文革对于国家经济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为缓和各方面矛盾、继续维持文革而不得不对“极左”进行一定调适。因此他支持周恩来为恢复经济秩序和打开国门的一切举措，还亲自为许多老干部平反，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这些都是毛泽东在不动摇“文化大革命”前提下对极左错误的局部修正。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这种自我修正又并非出于他的政治自觉，严格意义上讲，毛泽东始终不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化

大革命”和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错误的，不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故而当周恩来力图肃清极左荼毒，将矛头指向文革中所暴露的问题并加以纠正，进而可能波及对文革的重新审视的时候，毛泽东就势必对纠左工作的继续深入予以阻拦。因此，毛泽东在最后决断时选择支持江青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也正因为如此，接下来他还连续发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采用评《水浒》等各种方式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正确”的体统和颜面。<sup>[10]</sup>

总之，既要修补“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又要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政治方向，这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采取了一些让人看来是极为矛盾的一些举措：他既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支持对一大批老干部的抢救工作，同时又继续重用他发动文革所倚重的激进势力，让张春桥、王洪文当政治局常委，并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在具体工作中，毛泽东既批评江王张姚四人搞帮派，也批评周恩来。其间，他虽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但终究未能成功。不得已，毛泽东只得无奈地转而寻求“第三种力量”，并笃信这种力量一定会对自己心存感激而必然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sup>[11]</sup>因此，如果把“九一三”事件后所发生的各类重大事件，特别是党内高层的人事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话，对于1976年后中国政治生

态的突然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 参考文献：

- [1] 张化.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及其变化[J]. 中共党史研究, 1992(2): 61.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854, 855, 856.
- [3] 陈立旭. 浅谈周恩来1972年的整顿[J]. 党史纵横, 1994(6): 19.
- [4] 周恩来. 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致张文裕并转朱光亚(1972年9月11日)[C]. 周恩来书信选集.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617.
- [5] 金冲及. 周恩来传(四)[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2019, 2023.
- [6] 李庄. 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274.
-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873.
- [8] 王若水.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C]. 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 人民日报回忆录.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 187—188.
- [9] 逢先知, 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1648.
- [10] 陈旭立. “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J].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6(1): 138.
- [11] R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373.

责任编辑: 曾凡盛